

陈士榘
著



天翻地覆三年间

——解放战争回忆录

天翻地覆三年间

——解放战争回忆录

陈士榘 著

中共中英党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陈士渠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9
ISBN 7-5035-1256-3

I. 天… I. 陈… II. ①革命回忆录-中国-当代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史料 N. ①I251 ②E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3041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625
字数：269 千字 印数：1—11000 册
定价：16.00 元

开 头 语

胜利者在回首往事、总结经验时，往往容易贬低对方，掩饰自己的困难，把艰苦卓绝的斗争，说成了万事如意，一举成功。苏联红军在取得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所写的一些经验总结及一些将帅的回忆录，如：罗科索夫斯基主编的《战略学》、朱可夫写的《回忆与思考》、什捷缅克写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等著作，都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不同程度上回避了自身的弱点和矛盾，掩饰了他们在通往胜利道路上的曲折和困难。这样做给后人的印象是，前人的胜利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微不足道”的。所以，前人如果忘掉了自己的困难，后人就容易忘掉前人的胜利。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谎报军情、夸大困难、歪曲真相，或逃避责任、窃他人的功劳为己有，抬高自己在胜利者行列中的地位。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英国的丘吉尔等人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就夸大了他们各自战场上的敌情和困难，掩饰他们与德、意、日法西斯关系暧昧，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责任，贬低了苏联和其他各国人民及军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斗争成果。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美、苏等国出版的一些材料将自己写成救世主。极力贬低中国军队（包括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外国不承认中国的功绩也还罢了，作为中国人的台湾当局，至今也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

抗战中的功绩，这是政治上的偏见，是对历史的歪曲。

所谓历史，应该是过去事实的真实记录和经验教训的总结，首要的是求实存真。

《天翻地覆三年间》一书，从1946年国共双方在美国人“调停”下谈判破裂，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开始，到1949年4月我三野八兵团渡江作战解放南京，捣毁蒋家王朝为止。这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段光彩夺目的辉煌篇章。这三年之间，战事频仍，风云变幻，经常是昼夜兼程，疆场驰骋。最后，中国人民终于澄清玉宇，赢得了蒋介石集团发动的这场内战的胜利。矢言要在半年内消灭共产党军队的蒋介石，却在中国大陆的各个战场上树起了白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军民不仅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而开启中国历史的新时期，历历辉煌史，曲曲胜利歌。事实无情地给蒋介石打了一记大耳光。许多人至今并不了解，为什么直到1948年底淮海决战时，在装备和兵力上仍保持着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竟然会被一支装备和兵力处于劣势的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呢？有兴趣的读者将会从本书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以及某些意想不到的真实答案。是不是这样？就由读者来回答吧！

陈 士 渠

1994年4月于北京

附件：陈士榘在华东野战军

王 德 黄野松

陈士榘将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后任山东滨海军区司令员。抗战胜利后，调任山东军区参谋长。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后，又兼任新四军参谋长。解放战争初期，1946年10月初他到前方接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不久继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我们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一直到他在淮海战役后调任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司令员为止。两年多的时间，在他的耳提面命，亲切教诲下，使我们受益匪浅。特别是他率领前方指挥所担任前敌指挥时，我们一直追随左右，充当他的助手，从他亲自组织指挥的战役战斗中和组织领导司令部工作中，学到了不少在书本上难以学到的宝贵的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精神财富，使我们终生受益，至今难忘。

陈士榘在华野工作期间，一方面是协助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运筹帷幄的难得的好参谋长，另一方面又是经常受他们派遣到作战的重要方向上决胜疆场的著名的战将。他是一身而二任。据我们的记忆，他担任前敌指挥的时间，比在司令部主持工作的时间还要长。他每次出征，差不多都与华野政治部主任唐亮同志结伴而行。所以，后来人们把他俩率领的前指，习惯地称为陈、唐指挥所或陈、唐兵团，特别是在外线出击中原期间。

陈士榘具有坚强的革命斗志，积极的求战精神，忘我的工作作风。他在华野领导司令部工作，指导全军的参谋工作中卓有成效，他独立指挥的战役战斗，或协助野战军首长指挥的战役战斗中功勋卓著，深得陈、粟首长的信赖和中央军委的赞许。1973年春，陈士榘担任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毛主席接见了，他，还旧事重提，亲切而又风趣地说：“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华东战场上的几个大仗，打得不错。”这显然是指陈士榘在华野指挥或参与指挥的一些大仗和胜仗。事隔几十年了，毛主席老人家还念念不忘陈在解放战争中的战功。陈是参加秋收起义，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至今硕果仅存的老上将之一。毛主席生前曾多次当众意味深长地说过：“陈士榘同志，假如说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嘛！”

陈士榘在华东野战军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重大的，我们所知道的，极为有限，只能是一鳞半爪，挂一漏万。我们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要的概述，作为我们对已届86岁高龄的老首长寿辰的一份献礼，聊表我们的一份崇敬和敬仰之情。

一、竭诚拥护和支持陈毅同志的正确领导和指挥

1946年陈士榘到达前方时，内战已经打了三个多月，华东战场主要是苏皖边区的华中战场正处于严重关头，敌强我弱，敌军进攻气焰极为嚣张。华中野战军在苏中战场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山东野战军在淮北战场取得朝阳集歼敌一个旅的胜利之后，攻泗县未克。9月中旬，敌人侵占了两淮——淮阳、淮安，苏皖边区的大部分地区沦为敌后。我

军正与敌人对峙在盐城、涟水、宿迁一线。可以说，陈士榘走马上任是受命于危难之秋。

当时，新四军军长兼山东野战军司令陈毅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惑中。外患不可怕，内忧的阴影笼罩，一时难以驱除。由于泗县没有打好，淮阴没有守住，华中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把责任都推到陈毅和宋时轮的身上，甚至有人批评陈毅不执行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宋时轮也因此被免去了山东野战军参谋长的职务。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也对陈毅在淮北仗打得不好，而有些不满，并试图派徐向前来协助陈毅指挥打仗，当陈的助手。

陈士榘置身于党内和军内如此艰难而复杂的环境中，对陈毅抱有极大的信任，怀着无比的同情。特别是阅读了10月4日陈毅亲笔写给八师领导同志的信，深为感动，深受教育。他十分敬佩陈毅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委曲求全，敢于责己，甚至以违心的自我批评，接受不公正的批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促进领导之间的团结，以消除部队之间的埋怨情绪的统帅风度。

陈士榘也深知即使徐向前到华东前线来协助指挥，也不能解决华东和华中所面临的问题。问题并不在于战场指挥，而其实质是由于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方针的理解各不相同，各执一词，一时难以取得一致。作战思想不一致，影响到作战指挥不统一，作战行动不协调。

陈士榘对陈毅寄予莫大的希望，十分赞赏陈毅的耐心。他深信最终解决华东和华中党内和军内的分歧意见，还得依靠陈毅，也只有他才能解决党内和军内的棘手问题，这已为新四军的历史所证明。以陈毅的统帅智慧和以诚感人，

终可金石为开。所以陈士榘在这场争论中，衷心地拥护陈毅的领导，坚定地支持陈毅的指挥。

陈士榘对陈毅的拥护和支持，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也在战场上，用战胜敌人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他潜心研究敌人的作战特点和行动规律，寻求敌人的失误，创造良好的战机，先协助陈、粟打了宿北战役，紧接着又打了鲁南战役。两大战役的胜利，终于解决了党内和军内的分歧，增强了内部的团结。从此，战略思想统一了，作战指挥统一了，作战行动也协调一致了。陈毅笑逐颜开，如释重负。1947年元旦，他以个人名义，亲自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矛盾已解决，今后当集中兵力作战。”党中央和毛主席也放下心来，不再提派徐向前来华东的事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饶漱石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回到临沂后，又要把陈毅从新四军挤走。1943年新四军发生的“黄花塘事件”，就是饶漱石利用整风的机会，背着党中央，批斗陈毅，攻击陈毅在红军时期反对毛主席。后经毛主席亲自处理，饶漱石才没有得逞。这次又旧案重提，他妄图借陈毅在战争初期的某些失误，达到再次驱陈的目的。这一点，陈毅是心明眼亮的，他知道中央不会批准。果然，党中央、毛主席对饶漱石的计谋未予理睬，并提出“陈粟不可分，陈粟合则胜，陈粟分则败”。

陈士榘对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陈粟不可分”的领导体制，是完全拥护的，陈毅自从上井冈山开始，一直是陈士榘的上级领导，陈士榘也一直对陈毅十分尊重和敬重。粟裕在红军时期与陈士榘一起工作过，如今各司其职，工作协调，彼此尊重，互相学习。

二、积极参与制定作战方针和战役计划的决策工作

决策工作，尤其是战略转折和战略调整时期的决策工作历来是军事领导人一项最艰难最复杂的工作，也是一项首先要确定的最重要的工作。决策正确了，一通百通，诸事顺遂；反之，步履维艰，事事掣肘。解放战争初期，华东分为两区（山东和华中）四方（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分处两个后方，两个前线，更增加了决策工作磋商的难度。最高统帅部中央军委，最高统帅毛主席，直接统率两区四方的新四军军部和军长陈毅。他们都在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稳妥可靠的作战方针和战役决策，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往来电报多达上百份，先后提出的方案也有三四十个之多，对方案的反复次数之多亦难以数计，今日提出，明日又推翻，后天再提出，处于循环往复之中。

陈士榘到前方后，面临的第一大课题也是第一大难题，就是加入到磋商方针的行列，成为代表山东野战军的一方，因为陈毅一直在四方之间来回奔波面议，听取各方意见，又对各方做工作，折冲于各方之间。当时磋商的内容是十分机密的。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参谋人员不得与闻亦不知其详。现在保存下来的史料，只有唯一健在的陈士榘最知其详，其他各位领导人均已先后谢世，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史料。

磋商的焦点，也是争论最激烈、讨论时间最长、反复次数最多的一个问题，即“在什么地区集中兵力同什么敌人作战”。关于集中兵力打一个敌人，而不是分散兵力打两

个敌人，这一点在理论认识上大家是一致的，没有任何人反对。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在作战方向和作战地区的认识上统一不起来，所以在兵力上就集中不起来，长期分散在陇海路南和路北二至三处，形不成拳头。山东野战军主力跨陇海路来回机动，忽南忽北，一部分则长期滞留在涟水、沭阳前线；华中野战军主力也分散在盐埠和淮海两地，打宿北战役时来不及参战，陶勇的一师经过长途急行军才赶上鲁南战役。

关于作战方向和作战地区这个最棘手的问题，长期议而不决，原因何在呢？华中的领导同志认为华中重要，山东的领导同志认为山东重要，各执一端。华中的几位同志，认为华中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因此坚持我军亦应以华中为重点战场，集中两个野战军主力在华中作战，消灭进攻敌人的主力七十四师，收复两淮。有的同志甚至认为，敌人进攻临沂，目的是调动华中野战军北援山东，以便先解决苏北，而后再解决山东，各个击破，切不可上当。华中的同志众口一词，华中的部队不过陇海路。山东的同志则坚持集中兵力在鲁南歼敌。他们并不反对山东的部队到华中作战，但要求先消灭鲁南的敌人，解除敌人对临沂的威胁，消除后顾之忧，然后转入华中作战。

在作战地区上则有三种或四种选择：一是在苏北涟水地区就地转入反击七十四师；二是转兵鲁南消灭二十六师及快速纵队；三是出击淮北，调动敌人回援，然后歼灭之。出击淮北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西渡运河，在淮北路东歼敌；如打不好，则越过津浦路，到豫皖边建立根据地；如再打不好，就转到大别山开辟新区。另一种是：沿陇海路

向西推进，在邳县、睢宁、铜山地区与敌决战，威胁徐州，吸引鲁南、两淮之敌回援，以解华中、鲁南之危，然后出击安徽淮北地区。

陈士榘始终坚持首先集中兵力在山东地区和敌人作战，把山东地区作为华东地区歼灭敌人的重点战场。其根据是：敌人在华东作战的目的是打通津浦线，把华东、华北、东北连结起来。华中（苏皖边）直接威胁宁沪，敌人势必倾全力争夺；山东的群众条件、地形条件、气候条件等各方面均优于苏皖边区，把山东作为大量歼敌的基地，然后以山东为依托再向苏皖豫发展最为有利。

正在我方紧张的磋商过程中，蒋介石的伪国民大会在一片喧嚣声中开张，为了配合伪国大制宪活动，军事上制定了一项“结束苏北战事”的四路进攻计划。即分别由东台、淮阳、宿迁、台（儿庄）枣（庄）地区同时进犯盐埠、淮海和鲁南地区，并预定于12月中旬开始。这就出现了新的战机，经过两个野战军的电报往返磋商，12月9日至10日基本确定打中间的一路，即由宿迁向沐阳进攻的六十九师和十一师。粟裕于12月12日到达山野与陈毅和陈士榘当面商定具体作战方案，尔后分头部署，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消灭了戴之奇的六十九师全部。至此，关于作战方向和作战地区的争论暂告一段落。

宿北战役结束后，按原来商妥的作战计划，下一步打鲁南，这是在打宿北战役的作战会议上已经定下的，中央军委也已同意批准的。中央在电贺宿北战役胜利时指出：下一步“应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可是，粟裕却坚持在苏北打七十四师，打淮阴，而张云逸、黎玉于12月20日向

军委建议“一纵、八师回鲁南歼灭敌二十六师”。于是争论再起。

又是两种意见争论不下。陈士榘和唐亮两人商讨后，觉得事关大局，只有打鲁南敌人，才有利无害，应该坚持。于是他们两人将几个方案的对比及利害关系都报中央军委，请军委和毛主席考虑决定。陈、唐于12月22日给军委发了一份长电，建议“按原计划集中山野主力回援鲁南，粉碎敌人进攻后，再配合华野会歼苏北之敌”。一面发报，一面用电话向陈毅（在华中军区阴平驻地）报告，解释：“陈军长啊！打两淮七十四师的方案确实不行，有重大缺陷，关系到华东战场全局的大问题，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你是司令员，我是参谋长，我们之间没有个人恩怨，我有不同意见，如不提出来，那是对战争不负责任啊！”陈士榘高度的责任心，不计个人得失，也打破了参谋长只能贯彻首长意图，而不能动摇首长决心的惯例和条令的规定，果断而大胆地和唐亮一起直接向军委毛主席陈述他俩不同的意见。中央军委于12月24日复电，批准打鲁南战役。25日又指出：“要打一个比宿北战役更大的歼灭战。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部丧失，也有办法恢复。”至此争论才最终结束。这不能不认为：陈士榘和唐亮给军委电报和军委的复电起到了关键作用。

鲁南战役后部队整编，华东野战军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陈毅为前委书记，陈士榘是委员之一，在前委决策过程中，他就更有发言权了。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参谋长与首长是双重关系，行政上是隶属关系，党内是同志关系，党委会上是委员之间的平等关系。陈士榘在独立指挥的战

役中，在决策上的作用就更大了，有时不仅起关键作用，甚至起决定作用。在鲁西南，在豫西都是与唐亮一起决定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的。

在豫东战役发起前，粟裕渡黄河南下其基本意图是一心一意要消灭敌邱清泉的第五军，但邱清泉很狡猾，与七十五师等部密集靠拢，我军不好分割，粟裕先后几次提出好几个作战方案，均不能实施，不好打。粟裕日夜焦虑，冥思苦想多种方案，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当其于1948年6月9日提出新的作战方案征询陈士榘、唐亮的意见时，其中第二案提出：“以三、八纵一部佯攻开封，吸引其增援”。陈唐两位首长经过认真思考讨论后，由王德将他们讨论的结果，起草一份较长的复电于6月10日发给粟裕、张震。其主要内容是：“目前敌我在鲁西南成为胶着对峙状态，敌异常警觉，且有预定部署准备，正面不易歼敌”。因此，“一般的避开鲁西南转入敌之侧后，调动敌于运动中歼击为有利。”并提出：“在目前中原整个作战方针上，应掌握战机，以歼灭可能歼灭之敌有生力量以削弱敌人，错乱敌人部署，造成敌人错觉，捕捉歼敌主力有利条件与机会为有利，勿为固定对象或固定地区所限，免贻误战机形成敌我主力长期对峙反为被动不利。”粟裕接此电后，于12日决定放弃在定陶打五军的计划，并要陈、唐：“侦察开封情况，然后，或由你们奔袭开封，歼灭守敌；或佯攻吸敌回援，在运动中歼灭之。”15日粟裕最后定下决心：“先打开封，后歼援军。”并下令陈、唐：“包围开封而攻占之。”中央军委17日复电，“完全同意16日电部署，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由此可见，陈、唐的建议对粟裕改变打五军的决

心，并定下打开封的决策中，起到了促成和关键的作用。

三、努力完成军委和前委赋予的作战指挥任务

1947年，华东野战军的“七月分兵”是按照军委的指示执行的。其目的是为了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渡黄河、下大别山，转入战略进攻，也为我山东内线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逐步转入外线作战，并使华东野战军在内线实行战略反攻，到外线举行战略进攻。三路分兵的具体部署：（一）由叶飞、陶勇率领一、四纵队越过沂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二）由陈士榘、唐亮率领三、八、十纵队向鲁西泰安、大汶口的方向挺进；（三）陈、粟率领二、六、七、九共四个纵队集结于沂水、悦庄地区，待机出击。

陈、唐、叶、陶率五个纵队7月初突然进入鲁西、鲁南，对津浦路中段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攻势，使敌统帅部大为震惊。7月12日，徐州敌指挥中心立即下令从鲁中调回七个整编师回援津浦线，我军分兵以调动敌军的第一步目的顺利达成，敌军对山东重点进攻的阵势开始紊乱。

7月2日，军委直接电令陈、唐所部协同刘邓大军渡黄河后进行鲁西南战役。这样，就使这次分兵成为华野西兵团执行外线出击任务的开始。

陈、唐、叶、陶所率五个纵队，7月中旬，奉命分别对邹县、滕县、济宁、汶上举行攻城作战，当时正逢雨季，兵力又分散，均未得手。叶、陶两纵在鲁南山区来回转战，天上下暴雨，地下有洪水，前有河流阻挡，后有敌人紧追不舍，情况非常危急，环境极其险恶。陈、唐奉令派队接应，终使叶、陶两纵脱离险境，与陈、唐所部会合。

陈士榘、唐亮率五个纵队于8月初渡过运河，进入鲁西南，与刘、邓大军会师于郛城地区，正是刘邓大军即将出征大别山的前夕。此时，军委来电指出：“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从此，陈、唐兵团即直接听命于军委，肩负起支援刘邓大军进击中原战略行动的重大任务。

陈、唐率西兵团进入鲁西南后，除以十纵在北部梁山地区阻击和拖住五军外，另四个纵队转兵南下陇海路中段北侧单县、曹县和菏泽一带与敌人转圈子，紧紧拖住鲁西南的敌人，确保刘、邓大军南进的侧背安全。鲁西南作战，敌我双方都投入了庞大兵力，相持时间长达一个月，规模浩大，生活艰苦，适逢雨季，一片泽国，行动困难，战斗激烈，与敌展开了反反复复的拉锯战，双方都扭住不放，但谁也无功吃掉谁。这一个月虽未能大量歼灭敌人，但它的战略意义是多方面的。调动和分散了敌人，紧紧拖住了敌人；保证刘、邓大军完成了战略展开，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揭开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巩固了冀鲁豫根据地，为华野外线兵团挺进豫皖苏开辟了道路，打开了大门；也为陈、粟率部进入鲁西南开展新局面，扫清了道路，完成了掩护任务。

陈士榘、唐亮所率兵团，第二次受军委直接指挥，始于1948年2月20日，军委电示：“陈唐率三、八两纵至平汉路西与陈谢（兵团）主动靠拢。陈谢受陈唐指挥。在平汉以西、郑潼以南地区集中十一个旅以上兵力，主动寻求作战机会，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不要盼望和他部配合作战”，并指出：“在刘邓集中整补完毕，并和陈唐、陈谢靠

扰，确实建立战役指挥关系以前，陈唐（包括陈谢）仍受我指挥。”从此，陈、唐兵团在豫西的作战行动即归中央军委、毛主席直接指挥。

3月7日，军委又一次电示：“你们率三、八纵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并望能于两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

陈士榘、唐亮和陈赓在襄城召开了打洛阳的作战会议，确定：由华野三纵，陈、谢四纵担任攻城任务，华野八纵负责阻击郑州来援之敌，陈、谢九纵负责阻击由潼关来援之敌。并决定攻城部队采取隐蔽接近，突然袭击的战术，首先夺取四关，尔后采取连续爆破城门，突破后连续突击，速战速决，力争在三至五天内解决战斗，完成攻城任务。3月9日，外围战斗打响。11日黄昏开始攻城，三纵由东门、北门攻击，四纵由南门、西门攻击，12日凌晨，三纵首先突破东门，突入城内，12日下午，四纵由南门和西门突入城内，14日下午17时20分对守敌青年军二〇六师师部核心阵地发起总攻，一举全歼。赢得了洛阳战役的胜利。洛阳是我军外线出击以来在中原战场攻占的第一个大城市，影响很大。洛阳的城市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赞扬：“洛阳工作总结电已悉。此次总结很好，即转各军作参考。”

陈士榘受前委委托执行作战指挥任务的举其大者，在内线有泰安战役，在外线有洛阳、开封战役，这是著名的城市攻坚战，都取得攻城和歼敌的圆满成功。陈士榘对城市攻坚情有独钟，有其特殊的指挥艺术和独特的攻坚技巧。由他指挥打下的城市除上述洛阳、开封、泰安外，还有许